

在场主义文学研究·周闻道主持

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

应该说,任何文学形态的叙事,都有多种可能性,在场主义更是。

所谓“更是”,首先是因为在场叙事与书写对象有更紧密的关联。毋庸置疑,一切文学叙事都是以“事”为基础的,而作为客观存在的“事”,本身就具有多样性、复杂性、深刻性。这为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提供了坚实基础,但能否让可能成为现实却是有区别的。在通常情况下,作家与对象世界在叙事结构中处于主、客体关系,再贴切生动的叙述,都是叙事主体对客体的艺术“呈现”,两者之间存在一个“结构”的中介。而在在场叙事中,由于作家主体是“在场”的,与叙事对象处于同一场域,叙事当然地也就“面向事物本身”,成了作家通过文字对包括自我和对象这个“场”发现维度的指证;叙事流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形象,自然也具有了“经验的直接性”。

其次,意义的无限性与认知的有限性,决定了叙事的无限可能性。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作家培训班上,我受主办方之邀,向与会作家介绍在场主义。我在现场做了一个关于在场写作多种可能性的小游戏。当时班上有47名学员,我说如果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位作家写一篇散文,内容就是今天的这个文学讲座,最终你会惊讶地发现,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,且有好有中差;再进一步推演,扩展到470人、47000人,甚至更多,结论依然。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:为什么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等完全相同,叙事结果却如此千差万别?何为真相?最后,我得出三点结论:其一,任何一个存在,大到家国大事,小到老婆婆出门买菜,其包含的意义都是无限的,关键看你如何去发现更深刻、更有价值的意义;其二,存在意义的无限性,决定了在场的多种可能性,并进一步决定了在场叙事及其意义发现的多种可能性,从更好地“讲好一个故事”到更好地“构建一种意义”,不只是在场的写作方法论要求,更是在场的哲学本体论指向,甚至是衡量是否真正在场的重要标准;其三,任何一个存在都不是孤立的,而是普遍联系的,每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总是有限的。既然如此,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。所谓在场,就是一一场在发现路上的逆旅。

再次,存在的发展性、变化性,决定了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。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,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用非常简洁的语言,概括了关于世界运动变化的思想——时间不居,一切在变。这既为在场叙事多种可能性提供了“动能”,又提出了客观要求:面对纷繁复杂、变化无常的世界,或既不是这样、也不是那样的“难以界定的范畴”,叙事如何进行?显然,唯一的途径还是在场,即以贴近对象的灵动多样的在场叙事,适应变化的对象和不确定的世界。就散文而言,在场主义提出的“散文性”的“四个非”特征及其所倡扬的自然、自在、自由精神,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性回答。其中:非体制性指向自由精神,非主题性指向多维意义,非完整性指向片段经验,非结构性指向散漫灵动。就其他文学样式而言,怎样才能让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得以实现,让每一个作品都成为作者对“这个”变化的“存在”对象的在场感知、体悟、发现和书写结果,都

是作者独特个性经验对“存在意义的显现”的最好实现形式,还尚待探索。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,那就是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,让灵动的叙事留下更广阔的审美空间;留白不是残缺,是世界不确定性的存在真相。“一些符号更具有威力、更普遍、意义更深远,因为它们是空的。”^①只有这样,才可能让一种评论所说的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成为可能,才是灵动的在场。

还有,语言的张力,也决定了在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。任何体裁的文学叙事,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,正如凯文·奥顿奈尔(Kevin O'Donnell)所言:“无物在文本之外。”^②所谓创作,就是作家通过语言罗织叙事流,构建自己心目中“文学的理想世界”,并让生命的真相、人性的真相、存在的真相,在这个“文学的理想世界”中显形。这正是文学的功能,也是在场叙事的价值指向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指出:“语言是存在之家。”^③那么,语言如何通过在场叙事,表达世界的多样性、复杂性和变化性,关键在于语言的张力。所谓语言的张力,就是指语言在叙事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在表现力、冲击力、扩张力和审美性,它使存在在场再现、意义超越字面,引发读者的深度联想和情感共鸣。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叙述、冲突、留白、比喻等手法,在有限的文字中蕴含丰富的层次感、内涵性,增强感染力与读者参与感。语言的张力,既要求苏轼所说的“辞达”,也要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通过语言构筑的叙事流,实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“通过让句子记号中的元素对应于思想的对象,句子得以表达思想”^④。这才是问题的实质。

杨文丰与耿立先生,都是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的获奖作家,对在场写作与研究早已有积极的投入,并取得可喜成果。其中,杨文丰是把鲁枢元先生自然生态、社会生态、精神生态“生态学三分法”“三态理论”和肖云儒先生“三态同构”理念引入生态散文创作与研究,并创建“大生态散文‘三态同构’”思想的第一人。事实上,以“介入当下”为旗帜的在场主义,和以生态道义为担当的“大生态散文”之间,存在天然的内在关联。在场书写如何介入大生态,或者说大生态文学如何在场,以及“大生态散文”在场书写的多种可能性等等,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文学课题。本期本栏刊发的栏目主持人与杨文丰老师《在场:“大生态散文”的“三态同构”》的专题对话,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乏积极而新鲜的见解,供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交流。

同样,耿立的《在场主义散文的价值重估》,从在场写作与研究的切身体验出发,结合对在场主义源头理论的追溯、对在场主义开辟的话语空间的审视,以及对在场文本的解读,实证了在场理论创新在当下语境下的特殊意义,以及为后续的“非虚构写作”“个人史散文”和“素人写作”等提供的理论与实践资源,对当代散文突破“做小做浅做空”困境、重建精神高度与担当意识提供了重要启示;而在场主义关于“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完美融合”的审美取向,更具不可忽视的滋养中国散文发展核心遗产的文学史意义。

无疑,这些研究成果,不仅是探索在场叙事多种可能性的有益收获,也是对在场主义理论建设的积极贡献,彰显了在场主义的强大活力及在当下语境下的特殊意义。

①② [英]凯文·奥顿奈尔:《黄昏后的契机:后现代主义》,第54、51页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。

③ [德]海德格尔:《路标》,孙周兴译,第368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。

④ [英]维特根斯坦:《逻辑哲学论》,黄敏译,第11页,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21。